

梅州
世界客都论

■ 主编 谭元亨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梅州
世界客都论

■ 主编 谭元亨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州: 世界客都论/谭元亨主编.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623-2313-5

I. 梅… II. 谭… III. 梅州市-概况 IV. K9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9058 号

总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发行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E-mail: scut202@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责任编辑: 罗月花 张武华

印刷者: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375 字数: 240 千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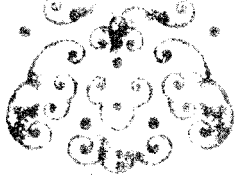
梅州——世界客都！

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客属地经济有望上一个台阶，客家文化日益为国人乃至全世界所关注。梅州作为世界客都的影响，更是一天比一天广泛与深入。于是，论证梅州作为世界客都的呼声，一浪比一浪高。

梅州是有这个资格的，客都也绝对不是自封的。是历史的情势，把它推到了这个位置上。因应这一呼声，我们才有了这么一个课题，力图全面、系统、深入地作出论证。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论证，不仅仅对于今天，而且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上，这一论证都是必不可少的。

众所周知，客家是汉民族支系之一、是广东三大汉民系之一。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客家儿女一路奔波，一路开拓，不畏艰苦，不畏险恶，与自然搏击，与生命抗争，深深扎根于大山深处，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大地形成了民系大本营，带着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与原住民生活、生产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客家文化。

早在1933年，罗香林教授就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这是对客家进行系统研究而具有理论革命意义的肇始。该著作的问世，曾引发了客家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到来。遗憾的是，此后，客家研究沉寂了长



达半个世纪之久。直至最近 20 年来，与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相吻合，伴随客家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客家研究才又迎来了新的热潮。客家研究在队伍组织与阵地空前壮大的同时，研究层面和学术水平也得到极大深化与提高。“客家学”作为独立学科已步入系统研究阶段。但是同许多悬而未决的客家研究命题一样，客家文化中心地即客都问题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客家大本营的一些研究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客家中心地、客都的研究理论与成果。固然，文化中心地具有历史阶段性，但这决不意味着客家文化中心地研究是不会有科学结论的。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论证，以历史事实为据，以加强客属地，尤其是客家大本营地区的共同发展进步为前提，多角度、多层面，扩大视野，大胆争鸣，集思广益，反复论证，将客家文化中心地研究这一课题推向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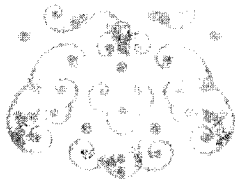
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这更是未来对我们的呼唤！

中山大学两名客家学研究的专家张维耿、杨鹤书曾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客都”的形成，他们认为：

客家民系形成于距今约 800 年前的南宋时期。要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不同历史阶段的客都。赣州是客家民系孕育时期的中心，因而赣州是客家孕育阶段的客都；汀州是客家民系形成时期的中心，因而汀州是客家民系形成阶段的客都；而梅州则是客家民系成熟时期的中心，因而梅州是客家民系成熟阶段的客都。

自明末清初以来，梅州市（早期称嘉应州）成了纯客住地区，也逐渐发展成为客家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齐（479—502）年间，便设治于程乡，后又几废几兴，南汉曾升为敬州，仍领程乡县，宋改为恭州，后又改为梅州。明废梅州恢复程乡县。南宋时，文天祥曾率军转战梅州一带，抵抗元兵南侵。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军曾两度攻占梅州。孙中山先生、周恩来同志先后于 1918 年、1925 年到过梅县。大革命时期，梅州老区建立了红色政权，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攻占过梅城。抗战期间，梅州成了广东的大后方，组织了许多抗日团体，创办了不少进步刊物，抗敌热潮异常高涨。1944 年，温鸣剑为青年军 129



师师长，征召了1400多名知识青年从军抗日。梅州是有名的侨乡，大量的侨汇促进了梅州经济的发展。邮电、交通事业非常发达。抗战期间，梅州的经济发展更快，梅县、兴宁成了客家地区土特产的集散地，兴宁的土布、梅县的皮革占领了赣南、闽西的大片市场。南宋有侯安国在梅州讲授经学，文风渐兴。自清顺治以来，梅州陆续设建书院，清末新学兴起。至20世纪50年代初，仅梅县一个县就有完全中学30间，相当于当时广州市的中学总数，赣南、闽西有不少学子前来梅州上学，小学则是村村都有，与中山县同为广东省文化最发达的县份。梅县话成了客家话的代表和标准语。中央广播电台海外客家话节目一直用了梅县话播音。可以说，梅州成了我国近现代的客都，这是客观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英雄所见略同。的确，梅州作为世界客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如同赣州作为客家摇篮、汀州被视为客家祖地一样，随着客家文化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自明、清以来，梅州作为客家大本营的中心地位日渐凸现。学者们一致认为，康乾以后，梅州经历“湖广填四川”以及向海外大迁徙，视梅州为祖籍所在的绝大部分移民，均已视梅州为其精神的故乡与客家之都。不少专家认为，客家形成于赣，成长于闽西，最后，则以在梅州出色的历史文化之表现，显现出其成熟的姿态。这里，既有人文社会环境的演绎，也包含有自然地理条件对客都空间选择所起的作用。正由于文化重心的迁移，方有“人文秀区”的发生，才使梅州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之乡、华侨之乡与足球之乡，这也恰好与今日的“四个梅州”，即“开放梅州、生态梅州、工业梅州、文化梅州”相衔接。从人才的聚集、历史名人的发生，也同样有着一个演变过程，而人才与名人的涌现，更是强化了梅州作为客都的效应。

客家方言的变迁与成熟过程，也证明了当今的梅州音为何成为客家方言中的“普通话”而为海内外所认同并为传媒所选中及采用；作为“客家大本营”的中心梅州与周边众多地、市的关系，广东作为客家第一大省对梅州成为客都的历史渊源，整个客属地的凝集、延伸、拓展与作为客都的梅州所肩负的重大使命，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尤其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的提出，恰好把粤、赣、闽三省交

界地的客家大本营包括在内，这正是客都梅州发展的最好机遇。但机遇也同样是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客都的现代化当如何推进，客都的文化品牌战略当如何打响？这需要怎样的改革支持以及经济上的支撑？作为客都的城市要素、形象定位，当有怎样的战略措施？尤其是在整个客家大本营经济圈的整合中，梅州又如何发挥其客都的龙头地位？这更是需要从广度与深度上下功夫的。

客都梅州的论证是一个高学术品位，又是有实际指导意义的重大课题，这既有理论上的提升，更有务实的精神，对客家学的推进，尤其是对客家属地人文、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乃至标志性的意义。客家文化正处于历史转型的重要关头，相信这部论著将对此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书一方面沿着“客家腹地”的形成，向客家文化中心的发展，最后众望所归，成为“世界客都”这一线索，一步步推进，加以论证；另一方面，对教育、方言、民俗及建筑等各个门类的历史演进，亦加以分析，从而强化“世界客都”的地位。这样，以史迹为经，以物事为纬，大约可以实现我们预期的目的。

在形式上，我们吸收众多专家的研究成果，但不一一作单篇列入，而是作为一部相对完整系统的论著呈现出来。这么做，难度很大，而且专家们使用的资料，也难免会出现重复，因此，希望读者们能予以体谅。

梅州市委、市政府正在全力进行“文化梅州”、“生态梅州”、“工业梅州”、“开放梅州”四大建设。新世纪“文化梅州”事业如火如荼，客家山歌旅游节的举办、黄遵宪纪念公园和客家博物馆等修建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部论著的出版，希望能够借鉴这一成果，为“文化梅州”建设服务。满园春色悦目，胸中豪情凌云。我们相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关心支持下，客家文化事业必将取得更大成绩，为广东文化大省的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目 录

第一章 梅州，客家腹地的发生	(1)
一、“一枝散五叶”——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与客家腹地的确认	(3)
二、客家大本营区域人地关系演变与梅州客家腹地的凸现	(12)
第二章 梅州，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	(20)
一、从客家腹地到文化中心及世界客都	(21)
二、梅州文化之乡及其形成机制	(28)
第三章 名人效应与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确立	(39)
一、从客家文化名人看客家文化中心的转移	(40)
二、近现代珠江文化“诗圣”——黄遵宪	(51)
三、客家文化中心转移变迁说	(59)
第四章 形成“世界客都”的历史因素	(63)
一、世界客都文化梅州的成因	(64)
二、从客家方言看梅州的客都地位	(70)
三、学校教育的强化对梅州客都形成的意义	(74)

四、从《广东小儿歌》看客都梅州的影响	(77)
五、客都梅州——客家民系的最终成熟与定型	(80)
第五章 客都与客家民居的演变	(86)
一、从土围、土楼演绎成的围龙屋的衍变与发展	(87)
二、梅州客都的建筑类型及其适应性特征	(95)
第六章 客都，在世界客侨的心中	(100)
一、世界客侨的心理认同	(101)
二、梅州在世界客家人中的重要地位	(112)
三、客家文化：海外客家人的精神家园	(119)
第七章 擦亮“世界客都”的文化品牌	(124)
一、经济全球化视野下“客都”梅州的文化构建及其开发利用之展望	(125)
二、客都文化旅游开发的区域合作	(129)
三、化与不化之间：客家围龙屋的现状分析与开发利用	(134)
四、关于梅州建设世界客都的建议思考	(139)
第八章 机遇与挑战	(144)
一、世界客都的形成与打造	(145)
二、“客人开埠”与现代创新意识	(159)
综论	(167)
附录	(171)
一、聚史成都	(172)
二、人文荟萃话梅州	(182)
三、始于赣，续于汀，成于梅	(186)
四、客家人的精神家园	(196)

第一章

梅州，客家腹地的发生

某种文化的彰显，一座城市的声誉，每每需“时”与“空”的两大因素。

“空”，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地理空间”，即一种文化所沉积的地域，以及这个地域中的自然环境。

而“时”，则是我们讲的“时间”，这自然是历史过程中的时间。拥有历史的时间，每每是沉甸甸，很有分量的。

时与空的结合，历史文化名城也就应运而生了。

客都梅州的形成，当应从“时”与“空”上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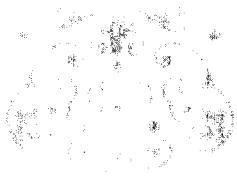
粤东山区盆地，这在地理上分明缺乏某种今天所称的“地缘优势”，它与大海并不相接，不似潮汕那么得天独厚，更无珠江三角洲的风生水起，可它又是凭什么在客家文化上独占鳌头呢？

而山居盆地，如何转劣势为强势，由瘴疠之地，变成生态名城，地缘“劣势”反成了生态优势，这其中的“转换”，又当有怎样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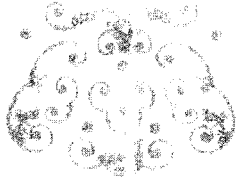
同样，作为蛮荒之地，为何在短短的几百年间，不仅“长”出了城市，而且被公认为一个民系的世界之都，这又是怎么来的？

众多的学者参与了这一课题的探讨。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梅州先行成为客家腹地的历史地理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首先，对客家第四次大迁徙之前，梅州业已成为客家人最大的集散地加以研究，“一枝散五叶”之枝，便在梅州，从而散去包括四川、台湾、广西等五个主要区域，使这批大移民对梅州腹地有了心理上的认同。而从赣闽粤边客家人大本营内部在不同客家民系成长的自然环境地域差异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又充分论



述了客家自赣南移民闽粤，而后又由闽粤倒迁赣南而生发的人地关系演变，认为地理环境机制与客家民系中心塑造密切关联；大本营内部人地关系的失衡，是引发客家移民倒迁入赣的重要原因，结果一方面强化了梅州客都地位，一方面令原在闽西的客家中心发生了移位，形成新的客家文化空间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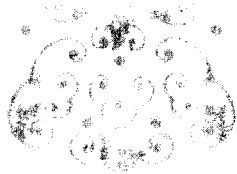
一、“一枝散五叶”——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 与客家腹地的确认

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则是在梅州已形成聚居地或集散地之际发生的，这给日后梅州作为“文化中心”的认同，乃至作为“客都”的认同，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务必阐述清楚方可服人。

一般认为，元亡明兴，在梅州算是“和平过渡”，没有什么战事，驻守梅州的元朝命官本就是汉人，所以，梅州的人丁便没受什么影响，发展迅速，包括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也这么写道：“……盖客家的大部分于宋末明初徙至广东内部后，经过宋明一代的生息，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则属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于乃思为向外扩张……”这便成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的一重大历史动因。

我们沿袭罗香林“五次大迁徙”一说，是因为他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是有相当造诣的，五次大迁徙的说法，也基本合乎历史事实，具有科学性、系统性，但这并不等于它就十全十美，无须补充与完善了。例如关于“第二次大迁徙”的历史动因，他归结为黄巢之乱，可从史书及族谱上考证，黄巢之乱之前的安史之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书称其更甚于引发“第一次大迁徙”的永嘉之乱。所以，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第四次迁徙，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诱发动因，都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需要有更深入的探究。

首先，早在南宋，梅州的人口就比北宋要少——注意，这正是客家民系形成之际。其间，主要是当地一直动荡不安，连年战乱，及至《温志·丛读》中称：“南宋后，迭遭兵变，土著逃亡者仅存一二，历元而明，中原衣冠，始稍迁至。”可见，当地的少数民族一经迁出，便没有再回来，梅州方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即客籍属地。我们也知道，当年追随文天祥抗元而辗转南粤者，梅州更去了大部分，而蔡蒙吉在梅州率众抗元，孤城喋血，被杀者更不计其数，全城十室九空……为此，梅州在宋、元交替之际，人口锐减，即便在元中、后期，也没多少返迁，为此，当朱元璋建立汉人的明王朝时，这已是1369年了，仍只能把梅州降格为程乡县。



也就是同一年，位处粤北的英州，也被明太祖朱元璋降格为英德县。这英州由来已久，早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平南粤之际，在现今英德境内设浈阳、浈江两个县，后来，先后归属于桂阳郡、始兴郡、广兴郡、衡阳、南海郡及广州。五代时，浈阳置英州治，浈江属广州。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五年（972 年），因浈犯讳，改为浈洸。第二年，改属英州，后属英德府，即二县同属英德府，元代改为英德路，后又降为英德州，属广东道。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降为英德县，属韶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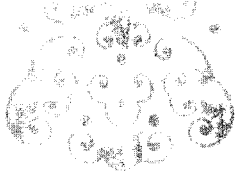
之所以详述英德县建制沿革，是想说明，英德自汉代始，人文历史渊源不可小看，尤其是张九龄凿通大庾岭之后，韶关一带，更成了中原移民南下第一站，其人口一度远超广州。所以，英德历史上含 2 个县，且作为府、路、州等建制，可见人口不少，为何到了明初，竟降为一个县呢？

据史料记载，陈友谅南方称帝，为朱元璋所灭，原来支持陈的地方，大都被朱的军队扫灭。偌大一个英州，历此浩劫，州城竟只余百十号人丁，其余大多被杀。没有人，别说“州”了，连县也难以支撑。罗香林的著作中，曾提到客家人在这之前亦到达粤北，与经珠玑巷入粤的广府人一样，其实有误。粤北包括英德被杀的人丁，当是广府人与土著人，而非客家人。客家人是在这次劫难之后，才填补进粤北的，这有粤北大量的族谱为证。

如作为英德的大姓郭家，其开基祖郭文一即郭进生，原籍为福建上杭，明宣德年间已在兴宁县十三都罗经水居住。明正统十四年（1449 年），移居广东韶州府翁源县。成仕年间（1473 年左右）再移居英德潭坑——这一脉，记载得相当清晰。韶关其他客家姓氏，也大抵是宣德正统至成仕年间（1426—1487 年）迁入的。

迁入韶关之际，客家人进入粤东梅州的也就更多了。有关方志均记载，这一段时间内，有大批的客家人，因人口拥挤以及粮荒，由闽西南的宁化等地迁入梅州、韶关，其中，迁入大埔为多——可参见邹鲁序的《大埔县志》。正因为这样，才有“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是来自宁化之石壁村者”一说。

因此，称宋末明初大批客家人迁入，当为不确，真正大规模迁入，则应是明中叶前后。根据梅州有关的人口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明初洪武二十四年，程乡县人口仅 1 686 户 6 989 人，作为一个县的规模都几乎不足，最早建县（东晋年间）的兴宁，在这一年仅 2 626 人，五华也仅 3 202 人，可是人口锐减——宋熙宁八年，程乡为 12 372 户。熙宁八年为 1 075 年，洪武二十四年为 1391 年，



间距为 300 年。

但到嘉靖十一年（1532 年），程乡人口便达到了 38 366 人，增长约 4.5 倍，平均为 12% 强，兴宁与五华，也分别达到 4 181 人及 9 000 多人；大埔则有近 4 万人。各县统计不一，资料不全，但可看出梅县（程乡）、大埔人口的剧增，正应了前述郭氏族谱及相关族谱的记载。史载：“明成仕年间，江西、福建均有人满为患，迁入韶州、嘉应州入户者不少。”

成仕年间，当是梅州人文初兴之际，长乐知县黄瑜，建有长乐学宫；兴宁知县秦君，奏准重建县城，改土垣为砖墙；又析海阳八都之地，置饶平县，大埔划归饶平。继任兴宁知县侯爵，更主修《兴宁县志》，为该县志有刊本之始。程乡县令刘彬，亦设东社学、西社学、南社学于城外。兴宁更改兴宁至程乡的驿道。成仕之后弘治年间，长乐至油田的灌溉工程——周瑄圳完成，可灌溉 3 000 余亩良田。程乡又设北社学，名濂溪书院，为大学者陈白沙所称道，曾作诗并社学记……

可以说，这半个世纪中，是梅州于明代之际相对稳定、繁荣的历史时期，也是梅州客家人人口剧增的重要阶段，但很快，到明中末叶，动乱又起，于是，便酿成了明末清初的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

没有明代中叶的聚居，业已形成的客家民系对梅州作为聚居地的认同，那么，作为第四次大迁徙的“一枝散五叶”出去的不同区域的客家人，就不可能视梅州为他们出发前的祖居地——这里务必有几个条件：

一是祖上在梅州有相对稳定的且有较长时间的居住与停留。一般来说，至少有一代或几代人以上，也就是超过半个世纪方可，明中叶的稳定，提供了这一先决条件。

二是祖居地留下的深刻的历史地理记忆。这一条，梅州同样是具备的，在群山环抱下，它拥有面积达 320 平方公里的兴宁盆地，110 平方公里的梅江区盆地，以及均为 100 平方公里蕉岭谷地、汤坑盆地，还有若干小的盆地平原，它们为移民适时的休养生息，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环境。

三是方言的整合、规范。众所周知，如今全国乃至全球的客家人，都认同梅县松口的客方言为标准音，尽管同在梅州范围内，如五华的客方言就有较大的差别。但是，共同的乡音，所牵引起的乡情则是最浓郁也是最稳固的，非别的内容可比。

上述三条，相对稳定的时间、深刻的历史地理记忆，以及在此地整合、规范

了的乡音，使梅州在逐渐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中，有了日益突出的历史地位，成为客家人最后一个大范围的集散地。

其实，在明中叶后期，梅州人口又呈下降趋势。如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程乡人口为38 366人，至崇祯八年（1635年），百年间，人口只余下一半，为19 647人。弘治十六年起，瑶民、农民起义连绵不绝；嘉靖年间，又遇大旱与蝗灾，继而地震，倭寇入侵，农民起义规模日大，震动了闽粤赣三省，一起延续到崇祯年间。

直到民族危亡之际，这些民变才逐渐平息，同仇敌忾，投身于抗清斗争之中。

可以说，自明末至清初，这上百年间，引发的客家第四次大迁徙，在客家文化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前面三次大迁徙，是客家先民聚落、凝结及至客家民系形成，呈现的是一种内聚的形态，那么，这一次，则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由内聚演变为向外的辐射，让中国及世界开始认识客家人，并且感受到了客家人的历史力量。

而客家人，则不再仅仅株守在闽粤赣大本营中，乃是扩散到了整个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了。

我们把这次扩散与拓展为主题的第四次大迁徙，称之为“一枝散五叶”。

也就是归结为五条迁徙的线路。

这五条线路分别是：

（1）由明成仕年间开始，自闽西、粤东，沿五岭山脉，进入到了粤北，再进入到桂东北、桂东，乃至云、贵、川，这条迁徙路线，一直持续到了清代。

（2）因抗清斗争，追随郑成功于东南沿海转战，最后迁徙到了台湾，成为台湾较早的一批客籍移民。其时间的跨度，也是从明末到清初，且再往后延伸。

（3）由于东南沿海的战乱，从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的“新客”，其数量甚至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老客”。其迁徙的时间，也同样在明清之间。

（4）沿海战事平息后，清政府允许沿海部分地区复界。除开原沿海居民所剩无几者外，大都是动员闽粤赣的客家农民向濒海地区迁移的，以至导致咸丰、同治年间的“土客大械斗”或“仇客分声”。

（5）“湖广填四川”或“实川迁出”。由于张献忠入川，战争连年不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廷采取了“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鼓励湖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入川垦殖。其间，客家农民亦汇入了这一批移民之中，在四川形成一个

“飞地”或“方言岛”。

当然，也有不同的描绘，或四条、或六条，但都差距不大。所以，还是用这约定俗成的“一枝散五叶”的提法，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只是在叙述过程中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这次大迁徙，其分布之面广、迁出人口之众多，在南方造成的经济、文化格局变动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于日后客家人的“六次崛起”，更是影响之巨！

下面，我们分线路一一阐释。

第一条线路，当是由明中叶成仕年前后，由梅州及其边缘地区开始迁出的客家人。应该说，此期间，是有人有出，有时入大于出，有时出大于入，或者说，前期以入为主，后期以出为主。

如今，粤北，如韶关、南雄、始兴、曲江直至英德的客家人，大多称其是于明代自福建上杭、粤东兴宁等地迁徙来的，乃至湘东一带的客家人，也是这么说的，这自然有大量的族谱为证。重提这一事实，是想纠正罗香林的漏误，尤为重要，将广府人与客家人的先来后到分清楚，不至于把“珠玑巷事件”也混同为客家人——一个15集的客家专题片，竟然把“珠玑巷事件”也列入了客家人的序列之中，实在是大谬也。“珠玑巷事件”的内涵，我已在《广府寻根》一书中加以发掘了，它与“葛藤坑传说”显然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一个重商、一个重伦理准则，这本是两大民系之根本分水岭。

为此，务必在这里重申，正是明初，朱元璋灭了在南方称帝的陈友谅之际，对支持陈的地域，实施了残暴的灭绝政策。这才使淞东、粤东地区，留下了一条“无人地带”，珠玑巷及韶关原兴旺的人丁——广府人及土著被灭绝后，才由后到的客家人所填补，以此不难解释，为何被视为广府人的圣地珠玑巷，后来竟无广府人所居住。其实，这一现象，在移民史上可谓不胜枚举。

而沿着五岭山脉，客家人依其本能——“有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亦由粤北向桂东北迁移。所以，广西各县，如今客家人分布已相当之广，其大多数则为清初迁入。清代桂林人龙启瑞撰写的《粤西团练局略序》中就有：“外郡（指广西）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垦种，数世后，其德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杰者或倡为西洋天主教的蛊愚民，用是党羽滋多。”这段话，说明客家人迁入已“数世”，时间不短了，而以“西洋天主教”即基督教“蛊民”，当是指太平天国运动了，也就是指响应来自花县的洪秀全号召发动起义的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

带的客家人。可见这一条线路迁徙的客家人，对日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何等之深。为此，把这一线路放在第一条。而该线路亦延伸至云贵川一带。太平天国被内外反动派合击后失败，左宗棠称其“兴于嘉应，灭于嘉应”，亦突出了梅州在这一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他是把祖籍梅县的洪秀全算作是梅县走出来的，而太平军最后一支队伍，则于梅县被歼。

第二条线路，则是客家人追随郑成功抗击清军，割据台湾，成为台湾最早的第一批客籍移民。

明代遗臣郑成功，建立金厦基地，以抗清复明。其第一功，则是率部渡过台湾海峡，从殖民者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而后，以台湾及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光复各县，甚至打到南京。

其实，早在郑成功之父郑尧龙，便于1636年击败最后一个海商刘香而实现了海上统一，无数华商在其麾下出征远东海域，台湾南部的诸岛则是根据地；1636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华商则成为日本海外贸易的承担者……正是这一系列事件，奠定了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基础，使一个以海洋贸易为经济根基的“海上帝国”得以形成。正如不少史家所证明的，在“郑氏海上帝国”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客家人，其最得力的部将刘国轩、咨议参军陈永华，都是客家人。

而梅州镇平（蕉岭）人赖其肖，聚义抗清，“誓以死报明”，人称他“大清之顽民，前明之义士”，战败后不知所终，亦有传闻入郑部。不过大埔江龙、罗大力等，则都成了郑成功所部的名将。如今台湾新竹、基隆等县的客家人，有不少是江、罗二名将之后，在台，以大埔命名的村庄有好几处。

早期已有客家人来台，这在德国史学家里斯（Ludwing Riess）博士、魏斯（Albrecht Formosa）博士在荷兰查阅档案得知：“客家人移居台湾渐趋成功，至17世纪止，持续约二百余年。”所以，日后来台的客家人，亦不顾清朝政府的禁令，亦先后偷渡到达。由于清政府严禁粤人入台，所以，福建客家人到台的要早一些，这便是漳州府龙溪、南靖、平和、诏安，汀州府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以及邻近漳州的广东饶平的客家人。在长达34年的渡台三禁令（1684—1790年）之后，广东客家人亦大批渡海来台了。这有潮州府的丰顺、揭阳、大埔，惠州府的海丰、陆丰、博罗，以及嘉应府的梅县、镇平、兴宁、平远、长乐的客家人。

雍正十年蓝鼎元在《粤中风闻台湾事论》中，更记有：“广东潮、惠人民，在台种地傭工，谓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众不下数十万，皆无妻孥。”——